

凝聚最大共識 務實推進宏福苑安置

柳凡

觀香港

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日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匯報過去半年的善後工作進度。綜觀會議全貌，儘管現場討論熱烈、居民訴求多元，但會議過程整體保持順暢，展示了居民關心家園、依法行使權利的理性態度。重大災難後的善後工作錯綜複雜，涉及法律、財務、建築安全及居民長遠安居等諸多層面，要求一次會議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與個別訴求並不現實。當務之急，是以最大公約數回應政府提出的各項精準善後方案，讓宏福苑居民早日走出陰霾，重建平靜安穩的生活。

一、恪盡職守落實支援，財務善後扎實推進

此次特別業主大會設有九項核心議程，涵蓋與前業主立案法團交接進度通報、工程及屋苑保險跟進情況等，居民最切身的權益問題均獲得正面回應。以大維修款項

退款為例，管理人合安接管以來克服了災後資料缺失、業主分散各區等困難，至今已寄出1732張退款支票，涉及總額逾1.1億港元。針對少數尚未成功領取的業主，管理團隊正透過「一戶一社工」機制及各區區議員全力協助辦理。這種將工作做深做細的務實作風，既切實維護了小業主的合法財產權益，也展現了特區政府委託管理人處事負責任的態度，為後續善後奠定了堅實的信任基礎。

業主訴求多元，但也要實事求是地看。因為每場業主大會均須恪守法定規範、按既定議程推進，若超出議程範疇、抑或逾越管理人職權的訴求，不但脫離實際，也不符合法治精神，更易遭別有用心之人借題發揮，最終損害全體業主共同權益。

二、實事求是解構難題，政府安置方案最具可行性

大會的另一焦點，是未受火災直接波及的宏志閣後續去留問題。會上，管理人

深入剖析了宏志閣若要「獨立營運」所面臨的巨大法律與實務障礙。例如，倘若宏志閣脫離屋苑其餘七座獨立運作，不僅需要大幅修訂大廈公契、劃分獨立通道，更要獲得按揭銀行與承按人同意，完成解散原有法團、清盤等一系列極其繁複的法定程序。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昂貴的金錢成本，在法律操作層面更是障礙重重。

正是基於客觀條件限制，目前已有逾七成半宏志閣業主務實地選擇了向政府出售單位業權。特區政府亦恪守事前承諾，展現出極大誠意與承擔，將原本僅供其餘七座居民的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一併開放予宏志閣業主選擇。此舉措兼顧了法理邏輯與居民現實利益，是當下最適切、最妥善的解決路徑，切實解答了居民對長遠安居的願慮。

三、跨部門團隊精準對接，積極回應居民合理心聲

會議期間，業主依法行使表決權，否

決了內容存疑的前法團核數師報告，並高票通過「兩個月內再度召開大會」的決議，展現了清晰的民意。同時，部分業主亦提出希望在出售業權前重返單位收拾私人物品，以及優化資訊發放機制等訴求。對於居民的切身需求，特區政府反應敏捷、主動承擔。政務司副司長牽頭的跨部門團隊已明確宣布，正積極籌劃新一輪執拾安排，大方向是儘量配合住戶遷入新居的時間，在確保建築結構與人員安全的前提下，安排居民重返單位提取物件。政府團隊積極主動的介入，證明當局不僅關注大局規劃，更全力照顧居民個人情感與實際困難。

四、兩年津貼紓緩壓力，呼籲業主早作長遠決定

為了讓受災業主能更彈性、更安心地規劃未來，特區政府早前更破格宣布，劃一為所有受災業主提供兩年期、合共30萬元的租金津貼，不論業主最終選擇何種長遠安置方案均可獲發。這一政策大為減輕

了居民當下的短期財政壓力，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以人為本」的關懷與對業主自主選擇權的尊重。然而，租金津貼究竟是過渡性的支援措施。從居民自身長遠福祉與全港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受影響業主宜認清客觀形勢，積極對接政府提出的各項長遠安置方案，儘早作出明確的居住決定，以便落地生根、重新出發。

宏福苑善後處置牽動着全港市民的心，現階段正是各項工作提速推進的關鍵節點。此次特別業主大會順利召開，交代了扎實的善後進展，也為政府精準掌握居民心聲提供了重要契機。特區政府推出的各項具體善後舉措，既有法理依據，又具客觀可行性，更是凝聚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廣大業主與社會各界保持理性包容，給予政府善後政策充分的信任與支持，攜手並肩推動各項支援與重置措施落實到位，協助宏福苑居民早日走出陰霾，重歸平靜安穩的新生活。

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的定位及角色(上)

學者論衡

孔永樂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全文共十八篇，涵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新質生產力培育、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等重要領域，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與對外合作指明方向。當中第七篇明確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共同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同時設港澳專章，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下，香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獨特窗口，發揮着無可替代的樞紐作用。伴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深化，加上國際格局進入深度調整的百年變局，社會各界對香港的文明交流功能、跨文化對話價值愈加重視。當前，如何在全新全球形勢下重新認識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內涵與差異，如何從政治、經貿、文化、教育等多維度推動中華文明與全球不同文明對話互鑒，具有重要現實和歷史意義。

一、時代變局下香港的國際文明定位反思

二十一世紀不同於冷戰二元對立的格局，全球文明發展走向多元並存、多極共生，深刻影響各國商業模式與社會發展形態。自十九世紀以來，中西文明逐步形成迥異的世界觀。西歐國家與後起的美國憑藉工業化優勢，建立跨區域政治與商業霸權，在巔峰階段深度影響亞、非、拉美地區，逐漸塑造出「西方文明中心論」，將

西方文明視為人類進步的核心標準。2011年，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更歸納出西方文明稱霸世界的六大支柱：競爭、科學、法治、醫學、消費主義和工作倫理。但這一理論已難以解釋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西方文明相對收斂的全新局面。

過去百年，香港長期充當中西文明交流的橋樑，「中西薈萃」的城市特質使其躋身國際大都會，而這一地位建基於近代西方文明主導全球、工業革命帶動歐美經濟騰飛的歷史背景。當時個人自由主義興起，藝術文化與科學技術快速迭代，確立西方文明的主流地位。然而踏入二十一世紀，西方文明霸權的局限性逐漸顯露，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等國際學者紛紛剖析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體系逐步弱化的趨勢，也讓香港長期單向聚焦歐美文明的傳統定位亟待重塑。

值得深思的是，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臘理性傳統，但香港與希臘的學術、文化交流長期處於薄弱狀態。筆者在本地大學畢業及工作，無論是本地高校求學還是任教期間，均甚少見香港主流大學與希臘頂尖院校合辦國際研討會或學術論壇。事實上，希臘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的重要合作夥伴，香港與希臘雅典分別為亞歐核心航運中心，比雷埃夫斯港與香港港口在經貿往來、文化交融層面具備高度合作潛力。筆者亦曾主動推動希臘知名院校與香港高校建立交流項目，助力學生溯源西方文明本源，但推廣過程遭遇現實障礙。

本地學界普遍存在以國際排名為導向

的合作思維，對於綜合排名不及歐美頂校的海外院校，合作意願普遍偏低。這一偏好直接導致香港的國際文明交流視野長期固化，集中聚焦歐美、日本、澳洲等傳統西方地區，難以形成多元文明對話格局。反觀部分QS排名處於1201至1400區間的日本大學，仍與香港院校搭建穩定的常態化交流機制，背後是日本長期深耕香港民間與學界交流的長遠布局，讓香港青年得以系統接觸日本社會經濟、動漫文化、時尚產業與民俗風情。

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扮演重要角色。隨著全球文明格局重塑，世界不再由美西方單極主導，香港的國際文明定位應拓展邊界，主動接納多元文明板塊。

在全新文明交流格局下，政府、商界、民間需協同開展多維度、多渠道的對外交流工作。香港特首政策組可立足香港獨特優勢，研判國際文明發展趨勢與全球形勢，精準確立香港多元文明的國際定位，隨後牽引政府部門、商業機構、民間組織協同參與文明對話建設。受限於社會資源與時間精力，特區政府需結合社會發展需求、人才培育目標、民族文化特質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制定契合香港長遠發展、相容中華文明底色的對外文明交流體系。

二、香港傳播中華文明的現存短板與挑戰

作為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核心窗口，香港同時承擔着對外傳播中華文明、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使命。國家「十五五」規劃第十篇第三十六章專門部署提升中華文

明傳播力影響力，明確要求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香港可在推動中國故事、中國聲音實現全球化、區域化、大眾化傳播貢獻所長，而學術研究、媒體傳播、影視動漫、藝術展覽等多元載體，正是對外輸出中華文明的核心平台。

中華文明的對外傳播，首要前提是本地社會對自身文明的深度認知與認同。香港的國際化發展與文明交流工作，應牢牢扎根於中華文明基礎之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對中國現代化與國際格局變革的觀點頗具借鑒意義，其提出中國崛起不僅是經濟層面的騰飛，更是全新工業文明與中華文明在亞洲的復興與崛起。在國際學術視野中，中國的發展突破了單純大國崛起的範疇，更是中華文明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體現，或將扭轉西方數百年的文明優勢格局，這也充分彰顯出中華文明兼容並蓄的核心特質。

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長期秉持單向輸出思維，試圖將自身政治體制、宗教文化、語言體系、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複製至全球，貶低甚至試圖取代其他文明。部分西方人士的文明霸權思維由來已久，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在社交媒體發出威脅性言論，直白暴露部分西方群體排斥、否定異質文明的極端心態。與此相反，中華文明向來崇尚包容互鑒、和而不同。依文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更應主動展現中華文明的包容

性與開放性，以此提升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

當前香港在中華文明傳播與對外文化輸出層面，仍存在兩大突出短板。

第一，「殖民管治」的歷史影響深遠，導致部分香港民眾乃至精英群體對中華文明存在認知偏差與固有偏見。金耀基教授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中指出，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提出的保守主義、全盤西化、中西合璧等主張，皆是古典中華文明遭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調整與探索。中國現代化的核心路徑，是在批判中繼承傳統、在突破固有認知中擁抱世界。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文明建設部署，必須正視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與時代意義，唯有深耕自身文明底蘊，才能向世界精準、有效傳播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

第二，局部社會存在的排外心態，制約了多元文明交融與人才集聚。近年來特區政府持續推出各類引才、留才政策，積極吸納全球人才來港發展，但社會層面的包容配套仍有不足。筆者常年觀察發現，眾多內地及海外畢業生有意留港就業、扎根發展，卻因粵語溝通、文化適應等門檻遭遇就業阻礙，難以融入香港社會。特區政府應主動引導社會風氣，培育年輕一代的多元文化包容意識，打造開放、相容、融合的發展環境，為人才集聚、文明互鑒、中華文明對外傳播築牢社會根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博士、講師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香港由治及興

議論風生

胡劍江

全國港澳研究會日前在香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演講會。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王振民教授和韓大元教授分別作專題宣講，圍繞安全與發展、香港國安法法律實踐等展開系統論述。這場宣講會召開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六周年之際，為社會各界準確把握香港國安立法的核心要義提供了清晰指引。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完善國安立法，正是確保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之策，也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應有擔當。

正如王振民教授明確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對於香港特區來說，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加強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機制建設是必答題。對比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等國在維護國安方面的立法實踐可以發現，通過立法修法釋法、執法、司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各國各地慣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維護國安只是開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既沒有「泛化安全」，也沒有追求「絕對安全」，是全世界最溫和、最講法治、最保障人權自由的國安立法實踐。

全世界最溫和國安立法實踐

從另一個維度看，韓大元教授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和鮮明特色。香港國安法實施6年來的經驗充分說明，香港國安法是香港居民權利與自由的保障法，打擊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安的違法犯罪分子，保護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國安法在實體法與程序法上均嚴格遵循法治原則，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並行不悖。香港法院處理國安案件時堅持程序正義，在法治框架下實現了安全與自由、秩序與權利之間的平衡。

進一步而言，統籌發展與安全，本質是守住「一國」根本、用好「兩制」優勢。安全不是發展之外的附加條件，要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鞏固安全；發展也不是脫離安全的單

純經濟增長，而是要在安全的環境中共同謀劃和推進。香港的實踐證明了安全與發展可以實現良性互動。香港在《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排名全球第二位，創下自2019年以來的最高排名；根據《世界經濟自由度2025年度報告》，香港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位列全球三甲的國際金融中心，去年公開招股集資額全球第一。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所言，如今的香港已是名副其實的「安全港」，安全已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

不斷完善制度和執行機制

香港完善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是因為國家安全形勢不斷變化，法治回應必須與時俱進。今後根據面臨的威脅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仍需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軌道上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事實上，香港的國安法律體系一直在動態完善中。2024年香港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2026年3月，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修訂生效；2026年6月，特區政府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訂立附屬法例，進一步清晰界定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這一套不斷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靶向打擊、精準施治。

香港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國際自由港，強調的是在開放的環境中動態維護國家安全，堅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進高水平開放。這一實踐為全球範圍內兼顧安全與發展、統籌開放與治理的國家安全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新範式。

回顧香港從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非凡歷程，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最大保障。安全是發展的根基，發展是安全的目標。完善國安立法不是束縛香港，而是守護香港；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香港只有不斷鞏牢國家安全防線，才能在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中站穩腳跟，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的發展，書寫「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歷史新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國際觀察

軒轅靖

7月20日，英國執政工黨黨魁安迪，伯納姆正式就任英國首相。他是英國十年來的第七位首相。自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英國首相就有如「走馬燈」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僅執政49天。

財政難題是伯納姆當前最大的困擾。就在伯納姆就職之時，英國國債收益率徘徊在5%，意味着財政部為存量債務支付難以承受的年利息。

伯納姆的競選綱領建立在再工業化、公用事業國有化和大規模住宅建設之上，每一項都需要巨額前期投入。然而公共債務佔GDP比重已達94%，稅收負擔處於二戰以來最高水平，而伯納姆本人又承諾不提高所得稅、增值稅和國民保險。這三條把他困在了無法騰挪的財政迷陣裏：既不能大舉借債，又不能開源增收，只能依靠經濟增長來消化成本。但現實是，英國不可能實現可期的經濟增長，能否擺脫衰退還是未知數。

沒有增長就沒有稅基，沒有稅基就談不上投資，沒有投資就更不可能有增長。這種無解的惡性循環，將成為伯納姆執政的最大絆腳石。

前任斯塔默遺留的國防開支缺口也是沉重負擔。伯納姆承諾補齊數十億英鎊的國防開支缺口，但他又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即必須在其他部門預算方面找到相應的資金消減空間。然而，國防開支要補齊，衛生、教育、地方服務，哪一個又不是政治雷區？

伯納姆的難處在於，削減國防開支會遭遇反對黨的猛烈攻擊，但削減社會福利又會失去工黨基本盤。總之，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走不通，左右支絀的麻煩會纏繞其身。伯納姆只能用所謂「效率提升」來彌合這個矛盾，但白廳的官僚體系在過去14年裏已經經歷了七輪精簡，再談效率提升，幾乎是不可能的。

伯納姆能擺脫「短命首相」宿命？

外交挑戰同樣不容低估。伯納姆需要同時處理三重關係，深化英歐合作但又不能觸碰「脫歐」傷痕，維持英美特殊關係但又面臨一個不可預測的特朗普政府，以及在對俄、對華等戰略議題上尋求獨立於美國的位置。

特別在對華關係方面，伯納姆在大曼徹斯特市長任內積極發展對華關係，2018年曾率團訪華，推動高鐵、綠色發展等合作。就在伯納姆上任前4天，英國政府宣布「國有化」中國敬業集團旗下的英國鋼鐵。這起事件給伯納姆的對華政策蒙上了陰影，他既要處理前任留下的棘手局面，又要在中英經貿關係和國內政治壓力之間尋找平衡。

內政問題是伯納姆的最大難題。能源價格波動隨時可能將通脹重新推高至3%以上。國民保健服務候診名單雖較峰值略有下降，但依然維持在數百萬人以上。伯納姆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清晰而激進，能源公有化、租金管制、大規模公屋建設。這些政策在競選階段為他贏得了選票，但進入執政階段後，它們很快會遭遇法律、財政和執行層面的三重阻礙。公有化需要議會立法和巨額賠償，租金管制面臨地產行業的法律挑戰，公屋建設則受制於規劃體系和建築產能。任何政策都要經過各部門尤其是財政部的首肯，如果沒有財政部的配合，任何政令恐怕都出不了唐寧街。

因此，伯納姆的難題不僅是政策的困境，更是英國政治體制的困境。英國智庫政府研究所分析認為，受外部危機、人口老齡化及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等因素影響，過去10年英國政府的治理難度明顯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員的頻繁更替又進一步削弱政策連續性和政府執政能力，形成惡性循環。

伯納姆若沒有足夠政治能量壓過各種反對勢力，最終恐怕只會成為又一位短命首相。

國際關係學者